

网络非虚构写作的公共性:起源、反思与重构

曹 然 张 健

(苏州大学 传媒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 近年来兴起的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旨在重建文学与社会之间联结的、涉及文学和新闻领域的边缘性文体,其理念、实践中蕴含着重要的公共性。然而,当下网络非虚构写作中的商业取向、娱乐取向逐渐压过公共取向,使它背离了自身的初衷。回顾历史可以发现非虚构写作产生于对当时流行文体的反拨,以对公共性的强调获得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对当下网络非虚构写作一系列表征的观察,可以发现其中对“我”的过度强调、写作内容的固化和判断性叙事手法的滥用使公共性沦为“背景”。基于存在的问题,应以艺术生产等理论为依据,从加强“生产-消费环节”的社会联结、以“改造社会”作为终极目标、以“公众认知”为评估手段三方面,探索重构网络非虚构写作公共性的路径。

[关键词] 网络非虚构写作 公共性 公众认知 判断性叙事

DOI:10.13916/j.cnki.issn1671-511x.2021.04.016

近年来兴起的“非虚构写作”^①是一种旨在重建文学与社会之间联结的、涉及新闻和文学领域的边缘文体。2010 年,国内文学界权威刊物《人民文学》开辟了“非虚构专栏”,于 2011 年发起“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标志着“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新的实践形式进入了主流视野,但是具体到怎样厘定“非虚构”的问题上,《人民文学》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范围,这种模糊性引发了关于究竟何为“非虚构”的讨论——有的从非虚构“是什么”切入,如非虚构即“对‘真实’的不懈追求和严格考证”^②等,有的从反面说明非虚构“不是什么”,如非虚构即“不是虚构”和“反虚构”^③,或者非虚构即“不仅仅是虚构”^④。作为对非虚构写作实践的回应,有学者为论证“非虚构写作”本土化的正当性,将“非虚构”与我国的报告文学、新闻通讯等传统体裁衔接起来;也有学者作了历史分期,指出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10 年的非虚构与 2010 年以后的非虚构存在着重大差异,受到截然不同的因素的影响^⑤。

但是,严格意义上的“非虚构写作”毕竟是一个舶来品,它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特定的动因、表征和诉求,不应当不加限制地扩大它的边界,掉入概念泛化的陷阱,如此不但无助于对它的理解,更使它丧失自身的独特价值^⑥。研究发现,“非虚构写作”的理念非常接近于哈贝马斯为文学公共领域所赋予的规范内涵:第一,公众广泛参与,并就社会文化议题进行公开和理性的讨论;第二,活动具有自主性;第三,内部充满了多元和差异;第四,锻炼公众,为参与政治生活做准备^⑦——“非虚构写作”理应具有很强的公共性。然而,当下网络环境下非虚构写作的商业取向、娱乐取向正逐渐压倒公共取向,又使它逐渐背离自身的初衷。应当深思如何发现被遮蔽的公共性维度。有必要回到非虚构写作产生的历史语境中去,爬梳它的发展脉络,并且勾勒当前网络非虚构写作的表征,进而找到发现和强化网络非虚构写作公共性的路径。

[作者简介] 曹然(1991—),浙江宁波人,博士,苏州大学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传播理论、传媒政策与法规。

① 为论述方便,本文将非虚构的文学和新闻统称为“非虚构写作”。

② 邓晓雨《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7 年,第 19 页。

③ 张文东《“非虚构写作”:新的文学可能性?——从〈人民文学〉的“非虚构”说起》,《文艺争鸣》2011 年第 3 期。

④ 杨庆祥《重建一种新的文学——对我国文学当下情况的几点思考》,《文艺争鸣》2018 年第 3 期。

⑤ 参见黄典林《话语范式转型:非虚构新闻叙事兴起的中国语境》,《新闻记者》2018 年第 5 期。

⑥ 2019 年年初,咪蒙团队针对《一个寒门状元之死》一文发表声明称“这是一篇非虚构写作”,正是对“非虚构”概念的误用。

⑦ 参见陶东风《论文学公共领域与文学的公共性》,《文艺争鸣》2009 年第 5 期。

一、相伴相生的公共性:非虚构写作的形成和发展

2018年5月16日,美国“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汤姆·沃尔夫逝世。他从20世纪60年代起倡导的“新新闻主义”与杜鲁门·卡波特的“非虚构小说”一并得到了新闻界和文学界的广泛实践,共同构成了非虚构写作的渊源。所谓“新新闻主义”是将文学手法运用于新闻报道的写作手法,其背后是一些新闻从业者对于新闻“客观性法则”的强烈质疑^①。“非虚构小说”则是关于事实本身的小说形式,但它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事实本身^②。“新新闻主义”与“非虚构小说”两者都强调“事实”,其不同在于“新闻”以事件取向为主,公共性更为突出,“小说”则同时包含事件、状态取向,比较注重个体表达。鉴于“新闻”“小说”相互交融的状态,本文并不对两者进行区分,一并纳入“写作”的范畴加以梳理。

在西方,非虚构写作的形成主要受到当时的社会思潮、政治经济理念和新兴媒介技术等因素的影响。首先是思想观念。1960年代,美国的社会民权运动、青年反叛运动和社会批判思潮对许多传统、主流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冲击,盛行的麦卡锡主义更使传媒界对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事实”信仰发生了动摇,人们不再相信已经沦为技术性操作手段的新闻专业主义能够还原事实真相,更不再相信它对于已经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有任何帮助,因此一种更新了事实观念的、更具解释性和倡议性的新闻形式呼之欲出。其次是政治经济因素。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市场因素扩散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传媒作为“第四权力”的公共属性随之黯淡下去,而传媒产品作为“烤面包机”一般存在的消费属性则有所上升,传媒受众由“公众”(citizen)降格为“消费者”(consumer)甚至是“顾客”(customer)。相对于枯燥的、公共领域的“硬新闻”而言,阅读体验更好的、个体视角的“新闻故事”更容易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再次是媒介技术的作用。包括纪录片在内的电子媒介相对于纸质媒介在呈现内容上拥有更为直观的表现力,所谓“纪实主义”“纪录片主义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创作,影像思维、在场感成为非虚构写作的重要元素,个体成为隐藏在“镜头”背后的讲述者。由此,诞生了大量优秀的非虚构作品,如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乔恩·富兰克林的《凯利太太的妖怪》、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汤姆·沃尔夫的《刺激酷爱迷幻考验》,以及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等。其中,阿列克谢耶维奇更以记者身份获得了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直接将非虚构写作推到公众面前。此外,包括何伟(Peter Hessler)^③、邓扶霞(Fuchsia Dunlop)^④等西方作家创作的中国题材的非虚构作品也得到了一大批忠实拥趸。

在中国,引入“非虚构写作”的代表性人物、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李敬泽对“什么是非虚构写作”表达了一种开放的态度:“我相信非虚构会给我们开出宽阔的可能性,但是现在……我也不知道它会是什么。”^⑤将非虚构写作引进中国的过程中之所以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一则在于非虚构写作很好地迎合了解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二则在于它接续了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同时也体现了对当前虚构写作中“典型化”所致负面效应的反思,以及对平衡文学性、真实性、思想性^⑥等矛盾关系的反思。具体到新闻生产领域,新闻文体伴随着媒体政策和定位的调整,经历了由改革开放前的“宣传体”、改革开放之初的“新华体”,再到全面市场化改革之后的“南周体”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公共性借由全面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专业主义理念一同推广,并且通过特稿、调查报告等形式得以突显——后两者构成了网络非虚构写作在新闻领域的前身。伴随着媒介融合趋势,传统媒体机构受到盈利困难和政策收紧等因素的影响,纷纷撤销了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的特稿、深度调查等部门,同时商业新媒体平台则接过传统专业媒体机构对公共性的声张,通过网络非虚构写作赢得人气,并试图从中实现盈利。仅仅2016年一年,就涌现了一大批主打

① 陆晔:《汤姆·沃尔夫及新新闻主义的现实价值》(2018-5-16 [2019-12-29]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33595).

② 司建国:《美国非虚构小说简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③ 何伟,美国人,代表作有《奇石》《寻路中国》《江城》《甲骨文》等。

④ 邓扶霞,英国人,代表作有《鱼翅与花椒》。

⑤ 陈竞:《李敬泽:文学的求真与行动》,《文学报》2010年12月9日第3版。

⑥ 曾于里:《“非虚构”的真实性与思想性问题——以梁鸿和慕容雪村作品为例》,《文学报》2011年12月1日。

非虚构写作的新兴商业新媒体平台,如“谷雨实验室”“人间”“正午故事”“地平线”“ONE 实验室”“中国三明治”和“真实故事计划”等;也成就了许多知名的网络非虚构写作者,如李海鹏、林珊珊、杜强、钱杨、王天挺、张瑞等。然而,此时关于网络非虚构写作的讨论,更多的是围绕如何通过售卖作品的版权进行影视改编展开讨论,以找到“盈利模式”为最终目标。对此,有学者担心“将新闻业危机化约为商业危机”^①的话语框架将“屏蔽”新闻业的公共性话语。

简而言之,西方非虚构写作最初凭借对“公共性”的强调,构成了对当时占主导地位文体形式的拨乱反正。随即受到新自由主义突显媒体“消费”属性的影响,“公共性”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但仍为一批非虚构写作者所坚持。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起步较晚,人们寄希望于它能接续国内文学和新闻传统,以其公共关怀回应本土发生的种种问题,当它发展到网络阶段,网络写作平台的“创业框架”“危机框架”又一次“遮蔽”了“公共性”话语。不难发现,长期以来关涉非虚构写作的公共性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公共性成为“背景”:当前网络非虚构写作的表征

这里以网易“人间”、“谷雨实验室”和“真实故事计划”2019年全年的非虚构作品作为研究样本,观察并试图概括当前网络非虚构写作的表征。通过对样本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发现:首先,对“我”的过度强调使琐碎的日常记录影响了个体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平衡;其次,单一、固化的写作内容限制了作品社会影响的充分发挥;最后,“判断性叙事”手法的运用在实现片面深刻的同时往往以牺牲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为代价。由此判断,公共性在当前的网络非虚构写作中已经成了“背景”。

(一) 写作主体:全民参与和“我”的外显

当前,非虚构写作主体正在由过去隶属于传媒机构、作家协会的记者、作家,转变为与网络创作平台订立契约的专业或业余写手,这种转变在内容生产模式中表述为从“OGC”(Organization Generated Content,机构生成内容)发展为“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专业生成内容)和“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将主阵地从《人民文学》等“OGC”刊物转移到网络平台的非虚构写作也符合这一规律。曾经备受关注的“ONE 实验室”汇集了韩寒、李海鹏等一众高人气作者,是典型的“PGC”,但最终因为找不到商业模式而宣告解散。有鉴于此,当前网络非虚构写作平台大都形成了以“PGC 为矛、UGC 为本的打法”^②,既通过“PGC”保障了原创内容的质量,又以“UGC”相对低廉的成本确保稿件的数量。比如,为网易“人间”供稿的作者包括司法机关供职人员、基层民警、法律专业学生、法制栏目记者、中青年作家、外国文学翻译、心理治疗师、越战老兵、全职妈妈等,为“真实故事计划”平台撰稿的作者包括医生、程序员、辍学生、刑满释放人员等,这使他们能够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他们所熟悉的工作、生活进行准确的观察和描述,赋予作品权威、可信的特质。

同时,对一些网络非虚构写作者而言,在作品中“突显作者本人”有助于提升文本本身的公共性价值。这与一般新闻报道将“我”隐藏在客观事实陈述之后,反过来却强化了既有偏见的做法和效果很不相同。《单读》杂志主编吴琦认为“一个非常生动的作者,一方面增加了文本的可信度,另一方面给读者提供了批判的空间,让他找到进入这个文本的位置,文本的复杂性、公共性价值也就成倍增加。”^③尽管网络非虚构写作主体的多元化从经济角度上只是节约成本的权宜之计,但不同写作主体的参与、主体身份的凸显在客观上确实起到强化作品可信度,乃至强化作品公共性的效果。因为,作者的显性为读者的判断、阐释提供了可能,读者得以与作者进行某种形式的“对话”,进而丰富文本本身的意义。

但是,也有一些非虚构作品中由于“我”的比重过大,使写作流于日常记录或情感宣泄,破坏了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平衡。比如早前,关于慕容雪村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的批评就指出作者

① 杨利娟《新闻业危机的商业主义救赎——以非虚构写作平台“真实故事计划”的创业实践为例》,《现代传播》2019年第7期。

② 《韩寒旗下“ONE 实验室”解散,非虚构写作的商业模式在哪里?》(2017-10-12) [2020-01-10], http://www.sohu.com/a/197576658_681737。

③ 《谷雨计划 | 自媒体时代流量为王 会讲故事的人往往很痛苦》(2019-10-31) [2019-12-11], <https://new.qq.com/omn/20191031/20191031A0N4C000.html>。

“无法管住自己的情绪,他扼住了叙述者的喉咙,不加节制地发出的都是自己的牢骚”^①。这也是目前许多网络非虚构作品的通病,比如《昔日的提刀少年,如今败给了生活》一文讲述了“我”的同学“老瓜”的人生故事,将上学时的“老瓜”提刀复仇的事迹视作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与工作后“老瓜”的落魄形成对比,抒发感慨“我依然记得他提着刀子站在楼道里,满脸冷峻的样子……估计是他这辈子最晃眼的一刻。”^②但是,到底什么因素导致了“老瓜”后来的落魄?作者除了用抽象的“生活”、“琐碎的日子”敷衍以外并没有说明,由此极大地削弱了作品的批判性;而且,作者从有限的生活经验出发,动辄上升到“我们这一代人”的高度抒情,也很难以令人信服。协调好“我”的位置,事关非虚构写作中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平衡,值得认真考虑。

(二) 写作内容:思维、判断和审美的固化

从规范性的层面上看,文学公共领域中必然充满了多元和差异,身份各异的人们会以不同的立场、观点看待问题,而且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被他人看见和听见^③。起初,许多新兴的文学体裁、新闻文体都是以挑战“成规”、突破“定式”的姿态出现的,但发展到后来往往自身又形成一套新的“成规”“定式”。尽管李敬泽等人反复强调非虚构写作具有开阔的“可能性”,但网络非虚构写作内容上单一、固化和偏狭的倾向还是越来越明显。

除了常见的针对亚文化题材、弱势群体的底层叙事之外,写作者们也开始将目光投向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反映都市白领的日常生活。以2019年腾讯新闻“谷雨实验室”的部分非虚构作品标题为例,《北京五环魔幻生活:程序员暴雨天垃圾桶上办公,艺术生3年换10份工作》《北京互联网“民工”图鉴:白领月薪几万只穿优衣库,超过35岁就会被淘汰》《北京互联网青年沉迷盲盒:周末不出商场,双11花了两万》《北京“睡城”天通苑图鉴:有人为它卖掉二环学区房,有人当宾馆仓库》《30岁白领惧怕体检,透支身体累积健康问题成最大焦虑来源》《没房没车的年轻人告别北漂,却发现自己已被老家同龄人落在身后》……不难为这些非虚构作品中的主角描绘一幅“画像”:他们是一群坐标一线城市,从事互联网等新兴行业,住在城市郊区的出租屋里,生活质量并不高的年轻白领;他们面临的困难也大都相似,包括住房、婚姻、工作、子女教育等。围绕这些选题展开的创作,不需要写作者专门深入特定环境,与生活其中的人士保持密切接触,引发读者关于某些社会问题的反思——因为,选题本身正是写作者“中产阶级的狭窄日常”。这种写作固然是必要的,但一旦它成为“定式”,所能引发的社会效果也将大打折扣,使原本严肃的作品沦为按照一定模式批量生产的、引发群体焦虑的廉价消费品。正如微博用户所指出的“不得不说我非常失望,他们已经不再写小人物的故事,写的都是一些网红、明星、出名的人,要么就是蹭热点”,“甚至有好几篇都让我觉得,他们是在写软文”,“之前有个写网红的……你要是非说写得像个宣传稿也能算是非虚构文学的话好像也行,但是我也总有一种被耍了的感觉”^④。

(三) 叙事手法:围绕“判断性叙事”的认知分歧

对于非虚构写作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讲一个故事”,因为故事最能体现身处其中的人的本质。为了“讲一个故事”,需要运用特定的叙事手法,在非虚构写作中就体现为“判断性叙事”,即在罗列事实的前提下,由作者通过清晰的陈述表明事实背后的意义。然而,“判断性叙事”手法与客观报道的“观点与事实分离”要求以及国内新闻界对客观报道的朴素理解“用事实说话”相冲突,其本质上则是两种关于事实的认识论之间的冲突:前者以为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事实本身的意义并不会自发地显现,需经过作者的有意“点明”而为大众所知晓、接受;后者则将公众视为能够独立做出理性判断的个体,只需提供事实的最新变动即可消除其“不确定性”。两者统一于更抽象层次上的“艺术真实”,而前者的深刻必然以牺牲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为代价。关于判断性叙事的认知分歧目前

① 曾于里《“非虚构”的真实性与思想性问题——以梁鸿和慕容雪村作品为例》,《文汇报》2011年12月1日。

② 王选《昔日的提刀少年,败给了生活》(2019-11-25) [2020-1-10] <http://renjian.163.com/19/1125/11/EUQSK2U1000181RK.html>。

③ 陶东风《论文学公共领域与文学的公共性》,《文艺争鸣》2009年第5期。

④ 新浪微博@成极上《谷雨让人失望,我一直都很喜欢看非虚构文学》(2019-04-25) [2020-03-11], https://weibo.com/5519166670/HrhQZkBuU?type=comment#_rnd1583919235034。

聚焦于技术性、操作性的层面上,回避“能不能用”的讨论,而是关注“用到什么程度”“边界在哪里”等问题。比如对《人物》杂志而言,当必须使用“判断性叙事”时,编辑部主张“不从单个细节(或事实)来判断人”,“单个细节不足以支撑一个判断”^①。

有关“判断性叙事”的问题和争议从线下延伸到线上的非虚构写作中。以《死刑犯的最后一天》^②为例,文章由“号头”尚静对死刑犯孙槐魁的叙述展开,以层层嵌套的方式规避滥用“判断性叙事”的风险,作者本人没有直接针对故事的主人公抒发议论,而是借讲述者之口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这并不能保证“判断性叙事”不成其为问题。开篇部分,作者交代了尚静因为与孙槐魁同居一室,有机会进行近距离观察,“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死囚挣扎的欲望、狡猾的本性以及扭曲的人性”,后文的叙述基本上都是对这三项定论所做的阐释和注脚。文章讲到,在孙的案件开庭之前,律师先后为他分析了“三个不利因素”和“两条有利因素”,使孙的情绪经历从“绝望”到“来劲”再到“心情不错”的变化。至此,讲述者从讲述中抽身,补充介绍了看守所希望律师给予“可能被判极刑的嫌犯”一些希望以便于管理的常规做法,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与孙的“后知后觉”形成强烈的反差,更直指孙“添油加醋地渲染律师的分析”,“扬言将来要如何帮干儿子们发大财”都是“不着边际的幻想”,进一步突显了文章主题——孙槐魁心存侥幸的求生欲望。尽管文章作者小心防止“我”溢出边界,却始终没能跳脱“判断性叙事”的局限。

三、重构网络非虚构写作的公共性

通过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公共性作为一条“暗线”在网络非虚构写作的历史形成与当前表征中或隐或显,难以清晰地把握。最初,非虚构写作的形成是作为对当时流行写作范式的“反拨”,以对公共性的强调获得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目前阶段,这种公共性逐渐为商业话语所“遮蔽”,甚至沦为“背景”。因此,有必要更进一步明确公共性对于网络非虚构写作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由此找到重塑公共性的途径。

如前所述,哈贝马斯认为文学公共领域的规范性内容包括“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公开讨论”“理性”“多元”“差异”“自主性”“政治性”等,其中“自主性”意味着它不受公权力的直接干预而是在市场中培育壮大,“政治性”则意味着它为公众将来参与政治生活提供锻炼机会。据此,作为文学和新闻形式的网络非虚构写作的公共性可以聚焦在三个层面: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环节(自主性,不受公权力制约),它能够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政治性),其社会功能必须进入公众的认知领域才得以实现。首先,从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来看,文学生产属于人类社会生产的一种特殊形态,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写作者不再是纯粹的文学创作者而是生产、消费链条中的劳动者,写作不再是个体的行为而是公共行为,作品不再是历史流传的经典而是市场上供人挑选的商品。其次,伊格尔顿从社会功能的角度考察文学生产并指出“文学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在产生之初就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和哲学含义……它的任务就是以艺术所体现的那些能量和价值的名义改造社会。”^③“生产形态属性”意味着网络非虚构写作的写作者、写作行为和作品与外界相互依存,不可能脱离“公共”而存在;而“意识形态属性”则表明网络非虚构写作天然具有“改造社会”的目的,不纯粹是供个人消遣、娱乐的事物。最后,网络非虚构写作的社会功能只有在其进入公众认知领域后才能真正实现,哈贝马斯指出“通过阅读小说,也培养了公众……报纸杂志及其职业批评等中介机制使公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们组成了以文学讨论为主的公共领域,通过文学讨论,源自私人领域的主体性对自身有了清楚的认识。”^④对网络非虚构写作的社会功能进行考察、衡量,必须以它是否能够进入到公共认知领域为评估手段,实现个别与一般的矛盾统一。

① 钱杨《在〈人物〉杂志采写特稿的实践总结和思考》,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3年,第7页。

② 晓渡《死刑犯的最后一天》(2019-05-17 [2020-03-12]) <http://renjian.163.com/19/0517/15/EFD151N0000181RV.html>。

③ [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④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卫晓璐、刘北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55页。

(一) 强化“生产-消费环节”的社会联结

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网络非虚构写作不可避免地包含写作者自身的思想、情感、观念、素质、修养、趣味以及心境等后天习得的、个性化的精神因素,作者必须尽可能地调动、融合这些因素,积极投身于公共生活,形成具有审美价值的形象——这是它与物质生产的最根本的区别。当前,网络非虚构写作者大都通过“签约作者”或“按件计酬”等方式与网络非虚构写作平台建立了合作关系,后者的生产运作、传播机制和资金支持都深刻影响了网络非虚构写作与社会的联结。

第一,设法突破来源不足和内容低质的困境。如前所述,鉴于UGC内容质量的参差不齐,多数网络非虚构写作平台都采取了所谓“PGC为矛、UGC为本”的战略,只是表达方式稍有不同。比如,“人间”为UGC作者的宏大写作计划“提供尽可能大的支持”,包括组建团队、支付稿酬等,尤其是其平台筹建阶段就主动寻找蓝领工人、同性恋等弱势群体,相应设立了“蓝衣坊”、“虹桥”等工作室,借此帮助群体成员实现激励自身、增强沟通的目标。“真实故事计划”平台召集了12个青年媒体人形成专门的写作团队,有组织地履行内容生产和来稿筛选、指导和加工等职能。为网络非虚构写作创作主体提供专业指导,有助于使作品更好地回应市场要求,并限制“我”的过度膨胀。

第二,确保作品被更多的读者所接收及消费。对于作为“准公共品”^①的网络非虚构写作而言,单篇作品的“效用”(阅读体验)并不会因为读者的增加而出现减损,更不会因读者增加而提高单篇作品的“供给成本”;反之,单篇网络非虚构作品的读者越多,越有助于拓展其社会接触面,进而充分实现自身的公共性价值。因此,网络非虚构写作平台应当尽可能拓宽发行渠道,扩大市场。“谷雨”依托母公司腾讯的用户基数优势,形成了以官网、企鹅号、微信公众号为中心的,以资讯平台、社交平台 and 垂直平台并重的“全平台分发”渠道^②。“人间”作品则主要通过网易新闻客户端推送和官方网站上的登载,但从访问和浏览数量上看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间”作品的话题制造力、舆论影响力。无论是出于扩大市场规模还是履行社会责任的目的,网络非虚构写作平台都应当确保其内容产品被更多的读者所接收及消费。

第三,提供充足资金以支持作品的再生产。在“产品思维”影响下,早期的网络非虚构写作平台、写作者的做法是将内容改编成影视作品,通过贩卖版权的方式盈利,但未收到理想成效。这是因为网络非虚构写作并非是完全的“剧本IP导向”^③,其首要目标仍然是产出合格的非虚构作品,而后的生产周期长、内容核实和改编成本高,更面临着许多版权风险^④,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变现”的能力。不妨借鉴国外经验,他们的资金来源除了依靠“产品转化”之外,还有公益基金会、高校和众筹的支持。比如,非虚构平台“Storyboard”的资金来源完全依赖于哈佛尼曼基金会,保证了稳定的收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设了专门的非虚构写作项目,通过研讨会或校友会赞助获取资金,为学生提供贷款资助; Krautreporter 和 De Correspondent 两家媒体各自建立了新闻产品的网络社群,通过众筹方式直接从读者中获取报道资金,出版无广告支持的独立杂志。只有在充足资金的支持下,网络非虚构写作才不至于沦为“市场的奴隶”而丧失“格调”。

(二) 以“改造社会”作为终极目标

考虑到自身的“意识形态”属性,网络非虚构写作更应当自觉以“改造社会”作为终极目标。一方面,作品丰沛的情感性、生动的经验性使它成为“补充生活之不足的一种慰藉”^⑤;另一方面,作品中运用的意识形态话语往往“暴露意识形态自身的弱点,泄露历史真相的秘密”^⑥,使作品具有批判性的意义,从而构成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纵观历史,大多数优秀的非虚构作品都将“改造社会”

① 闫龙飞《我国准公共品多元化供给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第11页。

② 《谷雨计划:用非虚构写作还原真实的中国故事》(2018-12-26 [2020-04-05]) https://www.sohu.com/a/284548263_100276578。

③ 《“ONE实验室”团队解散,这还是非虚构写作者最好的时代吗?》(2017-10-10 [2020-04-06]), https://www.sohu.com/a/197272956_114778。

④ 《正午解散:影视化遭遇狙击,非虚构写作的内外困局》(2020-04-01 [2020-04-1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2737807013769939&wfr=spider&for=pc>。

⑤ 王天保《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论》,《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

⑥ 王天保《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论》,《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

视为写作的终极目标,无论作者自己是否意识得到。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为例,作品围绕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地许多小人物的故事展开。由于苏联当局隐瞒了核泄漏的真实情况,人们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参与救援和清理行动,使身体暴露于高强度的核辐射,最后悲惨地死去。作者认真倾听了这些亲历者、目击者的讲述,并以她最大的克制做了如实的记录。作者相信,如果不去讲述这些小人物的故事,任由他们被吞没在时代的浪潮中,那么苏联真正的历史可能会被虚构、神话和谎言所取代。以马修的《扫地出门: 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力》为例,作品对美国密尔沃基市的贫困街区、拖车营进行人类学的观察,还原了一群底层租房者的生存困境。在许多起驱逐事件中,原本为保护城市贫民设计的制度,反而成了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负担——公共住房政策原本旨在为穷人提供舒适、安全的住房,但是由于穷人聚集且疏于管理,公共住房变成了卫生、安全状况堪忧的贫民窟;当某处住房发生争吵、打闹可能威胁公共安全的事件,房东被要求亲自出面协调,他们迫使租房者承担“妨害行为”的全部责任,以简单粗暴的驱逐来解决问题;此外,儿童保护服务局、房屋检查员等管理人员的工作,实际上又给穷人们造成了新的伤害……总之,网络非虚构写作不应止步于满足读者对底层社会的“窥视欲”,而是要通过揭示现实中存在的深刻矛盾,启发读者的深入思考,助推社会的发展、进步。

(三) 以“公众认知”作为评估手段

网络非虚构写作“改造社会”功能的发挥是以它进入到“公众认知”领域为前提的。有些网络非虚构写作纯粹以客观、准确记录公共事件、公共生活为使命,另一些作品则希望能够引导甚至制造舆论话题,形成社会合力,推动所反映问题的解决。此处不对两种情形作任何价值判断,但两者共同为写作进入公众“认知领域”提示了可能的路径。首先,要注意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材料。少数新闻事件自身带有离奇性、话题性的特质,加上运用了一些特定的写作技巧,很容易地将文章打造成了“爆款”,但毕竟属于偶然、突发的个案,且几乎不能避免“猎奇”的弊端。诚如南香红所言“如果只是写事情本身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事情之所以值得写,那肯定是有了一种公共性,有人类的共情,或者是关系到更多人,关乎于命运、意义、前途这样一些重大的共性,那么你才要写。”^①其次,写作时要善于从个性中把握共性的因素。相对于时异事异的新闻事件报道,非虚构写作往往更看重能够反映人性、命运等具有恒久意义的内容。在讲述人物的一段为读者所未曾体验过的生活经历时,需要注意在必要处引发“共情”,进而建立起作品与读者的内在联系——面临挫折、挑战,他(她)为何做出如此选择?我是不是能理解或认同他(她)做出如此选择?换作是我,我会怎么做呢?但凡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它们所描述的时代、环境、生活方式也许不同,但是反映和揭示的人性矛盾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也正是经典之所以能打动人心,散发恒久魅力的原因。最后在叙事方式上,网络非虚构写作应避免“过度阐释”,谨慎使用当前流行的“判断性叙事”。网络非虚构写作游走于“新闻”和“文学”的两端,追求“讲故事的艺术”。本雅明很早就发现了“新闻”在叙事方法上由于充满“解释”而破坏了故事的丰富性,他以希罗多德为例,认为其关于埃及国王命运的记录“极平实干涩”,但却不影响作品“数千年之后仍会令人诧异,催人深思”^②,正是这种克制的叙事方法使然。反观当下,网络非虚构写作中大量运用的“判断性叙事”在帮助读者揭示事物本质的同时,是否也导致了公共性的流失?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这些问题都值得今后的写作者们进一步考量。

(责任编辑 刘 英)

① 《专访南香红: 非虚构写作可以达到文学一样的高远境地》(2019-05-10) [2020-04-10],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398058。

② [德]汉娜·阿伦特《启迪: 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02页。

shareholders to a greater risk of losing control , but also exacerbated the operational risks and agency problems of listed companies. It is often seen in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that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tend to influence a listed company's decision process to their personal advantage. The share repurchase policy can manage market value , improv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nd replace cash dividends , which better meets the needs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Is it the case that the higher the ratio of pledged equity by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is , the more inclined listed companies are to make share repurchases? Based on the cross-sectional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2018 ,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ratio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equity pledges of listed companies i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cumulative share repurchase ratio. The book-to-market ratio , cash dividend ratio and return on total assets of companies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above relationship. Private companies , compared with state-owned companies , are more inclined to alleviat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equity pledge crisis through share repurchases.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not only enrich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in this field , but also hav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ulatory system of share repurchases in China.

(12)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on the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WU Peng , CHEN Si-yu , REN Jie-yu , SUN Wei-chen • 103 •

Based on the sample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in 2017 ,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on the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er the company's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is , the more the auditors disclose the key audit matters. Among the three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manipulation methods , sales manipulation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 followed by production manipulation , and discretionary expense manipulation which has the weakest impact. In addition , through further analysis , it is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Non-GEM listed companies , the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of GEM listed companies has weaker impact on the disclosure of key audit matters. The research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factors of influence over key audit matters disclosure.

(13) Toward counter-representation: on posthuman viral narratives in viral images ZHOU Wen-ji • 116 •

Through a multifaceted examination of viral images , this paper argues that viruses are a counter-representation medium. Based on this , it uses the epistemology of touch as a clue to conduct investigation of viral images from macro and micro aspects ,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viruses are embedded in systems , and that they have otherness , objectness , bodiliness , subjectivity and ontology. The narratives of viral images do not follow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 The narratives of indirect viral images are outside of realm of representation. The posthuman viral narratives move from ghostly representation to schizophrenic counter-representation. The subjectivity is in uncertainty as the posthuman subjects form a multidimensional cyborg.

(14) An exploration of the expressiveness of George Inness' landscapes WEI Jun-yao • 127 •

The landscapes of George Innes , a leading painter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in the United States , are particularly expressive with unique composition and color fused with his expressive and creative ideas , which had won wide recognition. His landscapes marke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national school of painting and the transition of American landscape painting towards modernism. Inheriting from traditional European paintings , the expressiveness of Inness' works comes from his love of nature , influence of stream-of-consciousness , inspiration and the role of self-awareness.

(15) The tendency of intersubjectivity of historical novel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CHEN Jiao-hua • 136 •

Historical novel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demonstrated the tendency of intersubjectivity , i.e. ,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writer , the character and the narrative subject;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the writer , the nature and the world; the exploration and re-enchantment of mysterious factors and unknown forces of the universe such as causal fatalism; and the exploration and expression of irrational subjects. This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evolution of literary concepts and creation , but also the influence of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new historical concepts. The tendency of intersubjectivity in historical novels has expanded the field of subject matter , enriched their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 and formed a polyphonic artistic world with many voices. However , it may also bring new problems.

(16) The public nature of online non-fiction writing: origins ,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CAO Ran , ZHANG Jian • 143 •

Non-fiction writing , which has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 is a marginal genre that aims to reconnect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t involves the fields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nd contains an important public dimension in its concept and practice. However , the commercial and entertainment orientations in current online nonfiction writing have gradually overwhelmed its public orientation , causing it to depart from its original purpose. In this regard , this study first reviews the history of nonfiction writing and finds that it emerged as a reaction to the popular genres of the time and gained legitimacy for its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with its emphasis on publicness. Secondly , through a series of observations on a series of representations of current online nonfiction writing , we find that the overemphasis on "I" , the solidification of writing content , and the abuse of judgmental narratives have pushed its publicness to the 'backstage'. Finally , based on theories of artistic production , we explore the paths of reconstructing its public nature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 i.e. ,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 connection of "production-consumption" , taking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as the ultimate goal , and using "public perception" as a means of evaluation.